

# 政治史的魅力:结构、事件与担纲者

林 鹄<sup>1,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人类历史是结构限制下行动者的行动史。再严密的结构,都会给行动者留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正如地理环境只能影响而非决定人类行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也只能决定行动者会面对什么问题,限制应对措施的可能范围,并不能直接决定行动者如何应对。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面临的根本问题。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阐明时代主题、行动者的应对及其后果。关注行动本身的政治史,有可能统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制度史,构成历史的整全理解。关键事件和担纲者,提供了整全历史的切入点。

[关键词]结构;行动者;时代主题;政治史;事件;担纲者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11.013

## 一、历史的时代主题

2012年,黄宽重先生出版论文集《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在代序的《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一文中,黄先生对20世纪史学潮流之变化有如下概括:“20世纪初以来,政治史长居中国史研究的主流地位。早期政治史研究着重上层政治结构与政治发展,诸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变法、党争、政局变动、政治人物与集团等面向都是常见的主题。后因史料刊布及欧美社会科学理论引进,新的研究议题与领域日渐拓展,学者的研究眼光开始从中央、上层、典章制度,转向地方、基层、庶民生活。社会、经济、文化等历史研

究议题成为学界新宠,发展日益蓬勃,反观政治史研究却渐形萎缩。”

对于20世纪前期,政治史以大事件、大人物为中心,黄先生的解释是:“历史研究在此阶段因出版典籍不多,重要图书不易使用,加上讨论上层政治结构、人物与政治发展等问题,仅需结合重要经典及二十五史等正史典籍,即能提出新见,成一家之言,故投身研究者众多,成果辉煌。”<sup>[1]</sup>不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时,前面还有一句:“所以如此,与清末以来的时代环境关系密切,当时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处境,亟思图强,格外关切政局变动等政治性历史议题。”<sup>[2]</sup>下面才谈到史料局限。收入文集时,这句话被删去了。

作者简介:林鹄,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宽重先生这么处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正因此,笔者不免有些困惑:传统政治史研究以大事件、大人物为中心,只是史料局限造成的吗?

近现代史研究者拥有的史料,比古史研究者多出何啻百倍。但这丝毫没有撼动以大事件、大人物为主角的政治史在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晚清史专家孙燕京教授坚信,“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脊梁”,她指出:“很多年里,不少研究者欣喜于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欣喜于‘宏大叙事’、治乱兴衰之外的丰富故事,致使政治史一定程度被‘轻慢’。但是,当我们能够回望人类社会进程时,琐碎的边边角角毕竟是海滩上的沙砾。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还是家国大事。所以白寿彝先生才感慨‘政治是历史的脊梁’。”<sup>[3]</sup>

我们还注意到,种种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近现代政治史围绕大事件、大人物展开的研究路径。相反,以研究当代大河移民上访这一地方性小事件蜚声中外的社会学家应星,在大河移民引发的思考的驱动下,最终投身宏观政治的深入探究——中共党史。他这样描述其心路历程: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个主要的研究发现是:上访者与摆平者尽管在具体的利益格局上处在相互对峙的位置,但他们却共享着某种权力技术和政治文化。……我想追问的是:这种政治文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习得的?我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之后出版了《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就是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村庄审判史”可谓“大河移民的史前史”。但说实话,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分析视角过于局限在基层政治的具体运作上,缺乏对宏观政治的深入探究。另一个是将1949年作为村史的起点,而这并非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成型的起点。正是基于此,我后来将目光转向中共早期党史尤其是苏区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新一代

领袖的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组织思想和群众思想正是在苏区时期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我对中共革命的研究兴趣,最初就这样来自对大河移民问题的追根溯源。<sup>[4]</sup>

因此,深受福柯影响、对福柯的理解比很多学者更为深刻的应星,呼唤“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在他看来,“日常生活、基层社会和普通群众自有其有别于政治重要性的生活逻辑,值得有心者去研究。但是,在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政治的重要性与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对日常世界的认识要建立在政治世界的认识基础上才能避免鸡零狗碎的格局或乌托邦的命运。”<sup>[5]</sup>

其实,这不只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特性,而是人类历史的共性。

时下政治史的衰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史被理解成了甄嬛传。如果权力是政治史的唯一主题,政治史被“轻慢”罪有应得。但笔者以为,政治史的核心不是权力斗争,不是宫斗——虽然这些无疑是政治史的重要内容,政治史的基本任务是阐明每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文明和制度担纲者”(应星语,详下)如何应对及其后果。

比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改革开放是笼罩一切的时代主题。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不明了这一母题,不大可能真正理解哪怕一个与世隔绝之人的个人史。再如西汉一朝两百年,与之相始终的时代主题是如何在继承秦代遗产的同时避免亡秦覆辙。<sup>[6]</sup>而北宋前期的时代主题是如何走出五代。<sup>[7]</sup>又如大清康雍乾盛世,其时代主题则是“为大清王朝争正统”,“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sup>[8]</sup>离开了清前期这一历史主题,恐怕难以准确把握清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sup>[9]</sup>

政治史可能是实现应星提倡的历史研究“整全性”的路径之一。明确了政治史的根本任务是阐明时代问题及其解决,从这一角度观察权力斗

争,才能摆脱甄嬛传式的对政治的庸俗理解,才能将社会演进、经济发展、文化变迁等统统纳入政治史的视野。

政治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如何理解人类活动,现代社会科学提出了结构/行动的二分视角。传统史学无疑偏重行动者,正史采用列传体是最好的证明。而自现代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其基本导向是超越传统从行动者出发解释历史的做法,将揭示行动者身后隐藏的历史结构视为史学的根本目标,行动本身的意义往往被忽视,只作为结构的表征出现在研究中。

而所谓结构,学界有不同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将经济因素视为最深层的终极结构,也有研究将地理环境、社会组织方式或文化心理模式作为理解中国历史的核心结构。此外,政治体制也被认为是一种结构,尽管往往被理解为其他更深层的结构导致的次生结构,在历史解释中的效力不如其他因素,属于比较靠近表层的内容。这是政治史日渐衰落的原因之一。

但人类历史只是一系列宏大结构的产物吗?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的行动者,只是纯粹的被动角色吗?这显然和现代人高涨的主体意识、对自由的珍视背道而驰。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那行动和结构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接下来的论述给出了答案:“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10]</sup>行动者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是主角。一部人类历史,就是给定条件(即结构)下行动者如何行动的历史。行动者的行动本身,是参与塑造结构的重要因素,是影响后来的行动者如何行动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意义上,地理也罢,经济也罢,社会也罢,文化也罢,乃至政治制度,都可以理解为参与塑造历史得以展开的特定舞台(结构)的各种因素。再严密的结构、再苛刻的舞台,都会给行动者的“表演”留下发挥空间。正如地理环境只能影响而非决定人类行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

体制,也只能决定行动者会面对什么问题,限制应对措施的可能范围,并不能直接决定行动者如何应对。表演而非舞台,才是历史的主要内容。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关注行动本身的政治史,有可能统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制度史,构成历史的整全理解。

## 二、事件与担纲者

政治史的任务首先是阐明每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这是影响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的重要体现。而对行动者的应对及其后果的探究,该怎么进行呢?关键事件、关键人物(不一定是大事件、大人物,详下),是整全历史的切入点。

什么是事件?对于理解人类生活,事件的意义在哪里?2000年,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事件’,是指与日常生活状态所不同的一种突变状态、一种‘爆炸’。”正是在“爆炸”中,“日常生活所有的关系才会被调动起来,所有的‘结构’才会成为‘可见的’”。<sup>[11]</sup>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身边某人原来很不起眼,但某一事件发生后,他在事件中令人出乎意料的行为,使我们对他刮目相看。这是因为,没有受到考验之前,他的品质没有表现机会,直到事件发生才得以展露。

另一方面,事件不能仅仅理解为既有结构的呈现,而是行动者在既有结构下对特定问题的回应,这一回应不仅改变了行动者自身,也改变了既有结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就是从这一角度研究事件的典范。“在他笔下,无论是路易·波拿巴,还是尚加尔涅或卡芬雅克,抑或是赖德律-洛兰或巴洛,都不仅仅是某个阶级面目模糊的符号或例子,而是一个个活生生、有个性、有心机、其言行充满紧迫性和偶发性的人物。”“类似波拿巴这样‘蚂蚁变狮子’、尚加尔涅这样‘有英雄而无功绩’、赖德律-洛兰这样‘有热情而无真理’的戏法在政治舞台上不断地上演着。阶级斗争当然是具有最

后决定性的力量,但由于行动者的复杂作用,使历史显现出了多重的因果性。”“在马克思那里,既是结构(宏观)和局势(中观)形塑了事件(微观),同时又是事件再生产了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行动者的同时着力,使事件波谲云诡,充满了种种悖论,社会学的一对基本概念——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也就深隐其间。”<sup>[12]</sup>回到上文所举我们对身边人改观的例子。他在事件中的惊人表现,可能是固有品质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可能经历了狂风暴雨般的天人交战,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实现了人格的升华。

最近,应星经过多年的学术实践,将“过程—事件分析”发展为一种他称之为“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的新研究方法。这是“一种带着结构性问题关怀的事件史研究”。“在这个层面上的‘追根溯源’体现为重新建立事件与总体史的关联,寻找和确定要研究的关键事件。”“何为关键事件,这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它们既可能是众所周知的大事件,也可能是为人所忽略的小事件。”“有些事件和人物看似小事件和小人物,实际上在偶然性的际遇中却起到了重要的甚至关键的历史作用。”“以中共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为例,‘追根溯源’即是要在中共革命史中辨析出具有总体史意义的社会行动者(他们既可能是领袖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可能是党内地位虽不显赫、但在某些关键的事件和制度中具体担纲的关键人物)。”<sup>[13]</sup>

“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还是“围绕文明和制度‘担纲者’来展开的事件史分析”。“担纲者”是韦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在打造世界诸宗教伦理中居于关键位置的、具有独特生活样式的特定社会阶层”。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是韦伯关注的要点。“‘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体现的是对现代中国文明及其社会制度形成中影响甚深的历史人物背后的地域色彩、家庭背景、学校生活和社会经历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此解释担纲者的行为。<sup>[14]</sup>

表面上看,研究关键历史人物“背后的地域

色彩、家庭背景、学校生活和社会经历”是老生常谈。以往学者研究人物的地域、家庭和社会背景,当然也是为了解释其行为,但这些因素作用于行动者的机制,大致可概括为利益驱动模式。比如地域,意味着同乡拉班结伙,维护共同利益。家庭背景、科举经历等等,起到的也是类似作用。

应星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他从韦伯那里学到了,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是影响文明和制度担纲者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一个文明的核心,就体现为其担纲者所拥有的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下面再引应星对项英的分析为例,说明以担纲者的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为中心的事件史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在“富田事变”发生后,时逢项英1931年1月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尚未有明确的指示,项英需要独立处理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实证史学的研究一般只是关注项英到任后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这种处理方式的影响和后果如何,却从不曾追根溯源地追问项英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事变。而我则是要对1931年1月前的项英做深入的研究,看他的地域和家庭出身如何,看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性格是怎样的,看他在历次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和态度是怎样的,看当时的政治决策是如何变动的,甚至还要看他在去江西路经闽西时的所见所闻。只有经过这种生命传记式的研究,我们才能理解项英到底是哪一类型的革命者,他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一种工作风格。<sup>[15]</sup>

“类型”“风格”不是中立的现象描述,不同的“类型”“风格”往往能反映担纲者政治见识的高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的大小,以及政治品德的高下,会产生不同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历史后果。

所以,“追根溯源”之外,事件史还重视对行动者行为后果的评估,“类型”或“风格”包含褒贬。我们不仅要解释行动者为什么这么做,还要

说明这么做的利与弊、这么做是否特定结构下的最佳应对。就史料而言,严格意义上说,历史确实不存在如果,但就历史真实而言,充斥着种种可能性。仅仅因为研究可能性不符合实证主义逻辑,或者因为没有公认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可能性,或者因为研究可能性太难,就将历史事实当成唯一的真实,不免有削足适履、掩耳盗铃之嫌。对可能性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才能较准确地把握事件发生时的结构及其演变。

### 三、偶然性和自由意志

当然,担纲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有理想,也会有欲望,可能拥有好的品德,也可能有弱点。关键人物由于某种偶然性而形成的独特个性,可能会对历史造成重大影响。姚念慈先生在研究清圣祖玄烨时指出:

玄烨的心理基本特征是内怯和猜疑,其言谈行事则表现为夸诞和矫饰,似相反而实相成。康熙朝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其原因、过程和结局,都可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在玄烨的许多看似真诚情感表达的背后,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深层意图;而每一次大的行动之前,却又几乎都能找到其内心冲突,并遵循某种固定的模式。<sup>[16]</sup>

可以说,玄烨的个性是造就清前期时代主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偶然性是人类生活挥之不去的“阴影”。宋仁宗的出现,不但改变了宋朝的命运,而且深深影响了明代历史进程。士大夫政治形成于仁宗朝,党争如影随形,北宋从此进入了多事之秋。<sup>[17]</sup>尤其台谏的强势崛起,是赵祯私心自用的结果,王夫之评论说:“仁宗作法之凉,延及五百年而不息。”<sup>[18]</sup>

仁宗的执政风格,如果史料足够,或许我们可以遵循应星分析项英的路径找到答案。但宋太祖则没有这么简单。尽管整体而言,五代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藩镇体制逐渐瓦解是大趋势,但大一统王朝会以什么样的面貌重新出现,

仍存在很大变数。从篡位前的人生经历来看,赵匡胤不过是受过些许教育的赳赳武夫。<sup>[19]</sup>这样一个人,在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中的表现匪夷所思。王育济先生这样评价陈桥兵变:

兵变过程中的缜密决策和细致运作,使“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奇迹的背后则凝结着卓识与理性,含蕴着政治良知。基于此,使得“宋氏启运,不类汉周”,酿造出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从而对唐宋之际的“治乱分合”以及两宋政治产生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sup>[20]</sup>

对于杯酒释兵权,王先生同样不吝赞美之辞:

“杯酒释兵权”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历朝开国之初几乎都要碰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由此造成的恐怖氛围则会扭曲和戕害整个社会心态,其形成的沉重的文化阴影,往往在几代人心中都难以抹去,这对政治的昌明,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均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这样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如果说“陈桥兵变”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酿就了一种较为文明、理性的开国氛围的话,那么,“杯酒释兵权”则又从更深的层次上巩固了这种政治文明与理性,其对宋代政治的影响也更为深刻。……以“杯酒释兵权”为起点,宋代开始逐渐脱退了专制君权的恐怖政治,形成了“不杀士大夫”“不罪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政治传统,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无疑又使宋代的政治向着文明和理性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sup>[21]</sup>

在上者哪怕一次身体力行,也胜过千百回的说教。笔者以为,比起太祖推崇文治的一系列举

措,这两次和赵匡胤、和大宋王朝生死攸关的军事事件的和平解决,对有宋一代风气的影响更为根本。

“追根溯源”不是万能的。同样的地域色彩、家庭背景、学校生活和社会经历,也可能塑造精神气质和伦理人格迥然不同的人,哪怕是孪生兄弟。“追根溯源”本质上是还原论。人类行为存在还原论无法穿透的现象。

事件的发生,可能是对行动者的全新考验,提供了行动者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日常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某人经历了某事件,从此变了一个人。

梁漱溟先生曾谈到生活中的灵活性:“不循守常规而巧妙地解决了当前问题,是谓灵活性;在一时一时形势变幻中而能随时予以适当应付,总不落于被动,是谓灵活性。”<sup>[22]</sup>既然灵活,那就不可能前定,而人是有灵活性的。

赵匡胤不是事先拥有了伟大这一品质,自然而然地做出了“杯酒释兵权”这样的举动,而是在这一举动中超越了经历,超越了环境,实现了伟大。

这就牵涉到人的主动性。古语云:“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近八十年前,潘光旦先生曾这样评论文化人类学:

所谓文化人类学,名为研究文化的人,实际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为是研究产生者,实际是研究了产物,至多也只是牵涉到一些产生者和产物的关系,以及产物对于产生者的一些反响;有的文化人类学家甚至于只看见文化,只看见文化的自生自灭,根本不看见人,即或偶然见到,所见到的也不过是无往而不受到文化摆布的一些可怜虫而已。<sup>[23]</sup>

人不是“无往而不受到经历摆布的可怜虫”。

梁漱溟先生在写于民国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论及西方文明特质之由来,这样说:

据我所闻大家总是持客观说法的多。例如巴克尔说的:“欧洲地理的形势是适宜于人的控制天然。这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主

因。”……又如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以为一切文物制度思想道德都随着经济状态而变迁。……他们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其实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这个话在夙习于科学的人,自然不敢说。他们守着科学讲求因果的夙习,总要求因的,而其所谓因的就是客观的因,如云只有主观的因更无他因,便不合他的意思,所以其结果必定持客观的说法了。……我们的意思只认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就是诸君所指为因的。却是因无可讲,所可讲的只在缘,所以我们求缘的心,正不减于诸君的留意客观,不过把诸君的观念变变罢了。<sup>[24]</sup>

梁先生不否认因果关系,他清楚存在“宇宙间一定的因果法则”:“这个法则是必须遵循而不能避免的,有如此的因,一定会有如彼的果;譬如吃砒霜的糖一定要死乃是因果必至之势,我爱吃砒霜糖而不愿意死,这时为碍的就是必至的自然律,是我所不能避免的。”<sup>[25]</sup>也许把“砒霜糖”换成鸦片,更好理解。鸦片会伤害健康,甚至导致死亡,这是“因果必至之势”。吸上鸦片的人“不愿意死”,是人之常情。而能不能戒得掉,最关键的因素是戒毒过程中的个人意志,也就是“主观的因”。个人经历、外在条件乃至以往行动表现出的个性,会产生重大影响(即上引文所谓“缘”,又称“外缘”,见下引文),但都不能预先决定成功与否。

梁先生这样解释“主动”:“其动也,皆非有所受而然,却正是起头的一动。起头又起头,不断地起头,其曰新新不已,正谓此耳。”<sup>[26]</sup>他又说:

语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不唯适用于文艺作家,亦适用农、工百业的发明创造,和军事、政治的事功成就。“文章天成”是说自有合理性在其中。“妙手偶得”是说灵机触动,非所意料。诗人巧得妙句,画家

有神来之笔,不唯旁人所不测,他自己亦不能说其所以然。若究问其致此之由,一切可说的都是外缘,都是凑成乎此的条件,而不是能用这些外缘条件的主体——生命本身。生命是自动的、能动的,是主动的,更无使之动者。凭空而来,前无所受。这里不容加问,无可再说。问也,说也,都是错误。<sup>[27]</sup>

“外缘”只提供了有助于此的条件,不能决定非如此不可。

韦伯区分事实与价值,强调社会科学只能阐明因果关系——一定的行为导致一定的后果,一定的目标要求一定的行为。对于价值也就是目标的选择,他坦陈无能为力,这是个人意志的产物。

成败可能只在一念之间。回到前面提到的身边人的例子,狂风暴雨般的天人交战中,一念之差,就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大概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事情,事后回想,当时咬咬牙就挺过去了。你没坚持住,别人坚持住了,人生从此完全不同。

人之为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自由意志,即主观能动性。没有自由意志,主客体之分是不成立的。这是个复杂的哲学问题,本文不拟介入。笔者只想说明:自由意志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日常生活体验,否则今人追求自由就毫无意义;没有了自由意志,人无所谓主体性,一切都是注定要发生的,不仅历史研究,所有研究也就丧失了意义。

人的一生,是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环境限制的一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是如此。也许政治史的最高境界,是探讨历史的关键时刻,伟大人物的诞生。

### 注释:

- [1]黄宽重:《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2页。  
 [2]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孙燕京:《清末政治生态与政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代

总序)》,见杨猛:《最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收入孙燕京主编:《满蒙权贵与20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年,第4页。

[4][11][12][13][14][15]应星:《从“过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赵鼎新主编:《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71-72,62-63,68,73,78,82,77-78,78页。

[5]应星:《“以史解经”与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6]参阅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六至九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一至四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7]参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二、三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8][16]参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自序”,第4,6页。

[9]笔者正就此论题撰作一部专著,前期成果参见《乾隆三十年的意义与不完全财政的奥秘——基于相关论著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5期;《永不加赋的背后》,《读书》2023年第5期。

[10]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0-471页。

[17]这是王夫之的观点,深为笔者服膺,详参林鹤:《变法、党争与士大夫政治——王夫之的政治理论》,《湖北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

[18]王夫之:《宋论》卷四“仁宗七”,《船山全书》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25页。仁宗打造的这一政治传统对明代的影响,容另文讨论。

[19]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7页)认为:“赵匡胤在三征南唐的过程中还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又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素养最高的优秀将帅。”依据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一则追述。孤证不立,加之情节离奇,笔者怀疑这一记载的可靠性。

[20]王育济:《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

[21]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第171页。此说更早见于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2][26][27]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培宽、王宗昱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71,568,569-570页。

[23]潘光旦:《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24][2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第53-54,60-61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